

## 说砚台

应敏明



桃纹，砚池浅滑，红丝毕现。可贵的是，砚台反面刻着一株弯曲的梅树，盘根错节，苍劲有力，底铭：为梅雪居士道光廿年写；落款：大某山民刻，印章：姚燮。姚燮乃清代宁波著名文学家、画家，字梅伯，号大某山民，著有《读红楼梦纲领》，今天甬上月湖的宁波茶文化博物院院址，曾是姚燮住所。只是不知梅雪居士是谁。

第二块，是我从天台收藏到的一方明代王穉登自用抄手歛砚。天台以佛宗道源、山水神秀著称，古物遗存很多。此砚长25厘米，宽18厘米，厚12厘米，尺寸较大，器形古拙沉稳，因遭火灾，一边有残。两边各有铭文，一边为行书“石端明藏”，铃印三方：石氏端明、家藏、玉兰堂。另一边铭八分书残文及王穉登名。石端明乃砚之戏称，玉兰堂乃王穉登恩师冯徵明的堂号。这是块劫后余生、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的名人砚。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江苏宜兴丁山紫砂故里收藏到一方乾隆年制的端砚。此砚长29厘米，宽20厘米，厚12.5厘米，重达10.5公斤，分量不轻。它原配红木天地盖，砚四周刻满螭龙纹，正面池心四周三边刻卷草纹，上端刻双龙捧寿；反面底铭：读书以博其识，修己以端其品。落款：乾隆七年王仲。刻工非常工整，典型的乾隆工。王仲名头一时查不到，但就这方端砚的气势，它的主人一定大有来头，这是块有官气的端砚。

这三方砚台有铭文，有传承，各有特色，都是难得一见的好砚。

怎样鉴定砚台的好坏？在平时的收藏活动中，我一般采用“看、掂、扣、按、哈”五字诀。但凡好的砚台，积水不涸，天然滋润不吃水。吐气一哈，水汽附在池上，不会很快蒸发。易发墨，不伤笔。对古砚真假的甄别，则要辨砚材、辨雕工、辨铭文，最后是辨包浆，通过“四辨”，识别出真假李逵。

在“盛世收藏”的今天，相对于炙手可热的古代瓷器和书画，古砚台收藏基本上还处于冷门状态，没有引起收藏家足够的重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又是收藏家入藏古砚的好时机。



清代红丝澄泥砚

(应敏明供图)

自古读书人都恋砚，因为两者须臾不得分开。旧时，一个秀才就算再寒酸，一方砚台总归有的，不然有辱斯文。帝王将相、名人雅士，就更不用说了。宋太宗《缘识》诗中云：时捻笔砚亦看书。米芾爱砚、东坡赏砚等典故，更是流传了千百年。

古人给砚台取了許多有趣的名字，如即墨砚、万石君、润笔先生，等等。在翰林总总的别名中，我以为“砚田”最为形象；文人在砚上蘸墨书写，犹如农夫在田头弯腰耕作。在传统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中，砚虽然排名最后，但它是压轴的，诚如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所说：“砚为文房最要之具。”

我国各地能做砚的石材很多，但大多不甚理想。石质偏粗，宜出墨汁却易伤毛笔；石质太细密滑溜，则难以磨出墨汁。恰到好处的砚台，唐代推出了四大名牌：广东端溪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

南部的洮砚，河南洛阳的澄泥砚。其中尤以端砚、歙砚最为名贵。如今端砚、歙砚、洮砚矿产资源日趋枯竭，只有少量产出，澄泥砚产量稍大。

我小时候，父亲简陋的书桌上，总是放着一本康熙字典和一块厚实的长方形端砚。端砚上方雕云蝠纹，砚身包浆浑厚，它给简单的家居添上了些许书香。父亲说，那是二三十年前的老东西了。父亲喜欢练字，空闲时常叫我帮他磨墨，这是我认识的第一方砚台。

长大后我喜欢上古玩，收藏过十几方古砚，尤喜刻有铭文的。那些铭文通常由砚台制作者本人或请名人题刻，或字或画。砚台刻上铭文，艺术、人文、收藏价值都上去了。

我收藏过三方有铭文的砚台。

我曾在宁波古玩城收藏到一方清代红丝澄泥砚。砚台不大，长18厘米，宽12厘米，厚2.5厘米，砚台正面上方雕刻有

粉黛何以英雄胆？  
——越剧《红玉》观后

岑颖



抗金名将韩世忠、梁红玉夫妇的故事，流传久矣，历来也有多种艺术样式敷演。梁红玉纵横沙场、为国捐躯的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在于她慷慨悲壮的英雄情怀。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上演的《红玉》，以横断面的艺术结构，选取著名的黄天荡之战为主要情节，从调度、音乐、唱腔、舞美、灯光、服装、道具等多方面入手，成功地营造出凝重而昂扬、慷慨而悲壮的基调，保持了“浙百”一贯的高水准审美。

我喜欢这种横断面的结构方式。它可以使创作者集中诸多矛盾、各种矛盾，在剧烈矛盾的推进与爆发中，更为透彻地呈现人物心理，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比如《雷雨》，就是这样的作品。不过比之曾经以严格的“三一律”为结构规则的话剧，戏曲中并不多见这样的方式。《红玉》以梁红玉巡查回营，魏良臣传旨弃战切入，直指“战不战”“如何战”这两个核心问题。这一“战”，砍掉了诸多细枝末节的交代，单刀直入，干净而利落。

故事演进中有很多导演的奇思妙想。比如《研战》一场，从众将士列坐请战，到张半与两位将士的先后出列，节奏紧凑而富于变化；红玉请战时夫妇两人相视无言，握手、收光的处理，算得上此时无声胜有声。又如《探战》一场，夫妇二人不约而同带人乔装暗访，摸黑交手的场面也做得颇为好看。

但这个作品，依然有很多不可回避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当为剧本。

横断面的结构方式虽然有利于集中矛盾，但如果故事本身没有矛盾呢？《红玉》所有的矛盾，早在上半场就已经解决了。皇帝苟且偷安，一味求和；魏良臣挟旨威吓，疾言厉色。战，是抗圣旨；不战，则人心散；战，兵力悬殊；不战，国仇难报。这毫无疑问是全剧最有戏剧性的两场戏。而到下半场，夫妇两人走向战场，既无内心的抗拒，也无外来的阻力。没有矛盾的结果，导致最终梁红玉擂鼓的高潮推进非常乏力。加之上阵击鼓之前下场抢救也耗费不少时间，高潮之前的情绪

全被掐断。几乎是全凭音乐，才撑住了这一场慷慨悲歌。

这里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是什么促使梁红玉褪女装、披战袍、戴盔甲，站到战鼓前，即便身中敌箭仍然越战越勇？从认知上我们当然知道，是家国情怀。但艺术不能满足于“认知”，更需要“感染”，只有剧中人的情绪积累并推进至“不得不然”的程度，他们的一切行为才合情合理，才站得住脚。而显然，单凭金莺、玉燕来报赵一、张半的死伤，远远不足以到达“不得不然”的程度。

事实上，对于韩家军坚决主战的心理动因的刻画，剧本处理得也并不恰当。黄天荡之战，是为了复仇，还是力挫敌军锐气，使其不敢背信弃义，从而求得百姓一时安宁？剧本虽也有提到后者，却是轻描淡写，更多地强调了将士们“复仇”的心理。然而为了复仇去挑衅已经回撤的十万敌军，是否合理？复仇固然需要，但抵抗侵略的根本目的，当然是百姓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身为一代名将，是否更该有这一份悲悯的大情怀？

该剧的另一个大问题，是表演。

全剧中笔者最不喜欢的，是《击战》前半场。大战在即，生死未卜，夫妻俩互诉衷肠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高潮之前，有一个情绪的回调，也是艺术处理的需要。只是，这是一对名将而非忧思百结的文人，两人久经沙场，梁红玉更是英姿飒爽，不落俗套之人，临别壮行，她的柔情，该有一份“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慨。可惜“勇冠三军”的韩世忠和“千里单骑”的梁红玉，生生被演成了陆游与唐婉，营帐也就不幸演变为“小红楼”了。

成熟的演员，最大的危险大概就是陷于自己的表演惯性里，难以自拔。章益清与蔡浙飞从艺多年，舞台经验丰富，两人多有合作，当然更有默契。但这熟悉的气场熟悉的人，正成为束缚创造的绳索。梁红玉的唱腔、念白常常处理得过于柔弱，致使人物的整体形象缺少了最不该缺少的英气。

或许是戏剧演出的缘故，一些场次表演节奏处理得较为拖沓、粗糙，比如魏良臣与韩世忠夫妇争执、上阵前五诉衷肠等等。

愿改，愿更好！

最后，请将画蛇添足的《尾声》砍掉吧！

金氏武侠的当代变奏  
——评现象级武侠剧《山河令》

车厘子

花真金白银，在优酷网上一集一集看完热播武侠剧《山河令》。尽管越到后边，剧情越弱，但似乎并不妨碍该剧大红大紫，势必成为年度现象级网络剧，尤其在近年来国产武侠剧乏善可陈的大背景下。

一部剧能大火，固然有多种因素，从我个人观感来说，这部剧最突出的特质有两个：其一，它既是一部武侠剧，也是一部“耽改剧”，改编自包含“耽美”元素的网络武侠小说《天涯客》，许多“腐女”观众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其二，该剧具有鲜明的“金庸风格”。

确实很像金庸剧，我可以罗列出一堆相似点。剧情的梗概是围绕江湖传闻能打开宝藏宝库的琉璃甲，以五湖盟为核心的各方势力纷纷登场抢夺锁钥，由此牵扯出武林中前前后后桩桩件件引发腥风血雨的阴谋阳谋。剧中所谓藏有天下各派武功秘籍的宝库，仿佛是《天龙八部》里位于大理无量山中琅嬛福地的翻版；坊间盛传的童谣“五湖水，天下汇，武林至尊舍其谁；彩云散，琉璃碎，青崖山鬼谁与悲”，像极了《倚天屠龙记》里的“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容炫在与五湖盟五子比武时失手中了赵敬事先抹在高崇剑上的毒药而发疯至最后惨死，则让人联想到《雪山飞狐》里胡一刀与苗人凤比武时被田归农偷袭抹在兵器上的毒药害死的情节；温客行在船上吹奏一曲《菩提清心曲》以助周子舒运功疗伤，总觉得类似《笑傲江湖》里任盈盈为令狐冲弹奏的《清心普善咒》；丐帮等门派为强索琉璃甲而当众逼死安吉四侠，又使人想起《倚天屠龙记》里五大门派上武当山发难逼死张翠山、殷素素夫妇的场景。

我没有看过小说《天涯客》，据网友解读，《山河令》剧情与原著小说内容已相去甚远，所以我在追剧过程中，越发觉得编剧本人可能就是资深金庸迷，他在剧本许多细枝末节处不忘向金庸致敬，例如《山河令》保留了“五岳剑派”“巨鲸帮”等金庸小说首创的江湖门派；华山派掌门于丘峰也被塑造造成一个在感情上始乱终弃的“渣男”式伪君子，依稀能看到金庸小说里华山两任掌门岳不群和鲜于通的影子；《山河令》甚至直接沿用了金庸小说里的武功名称，周子舒在武库里发现“百变千幻云雾十三式，衡山派的绝学”，

这就是《笑傲江湖》里衡山派的独门剑法，衡山掌门莫大先生最为精通；周子舒更是说了《神雕侠侣》里郭靖教育杨过的原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作为中国独有的一种类型文学，武侠小说的长处和短板都很明显，而金庸既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创始人之一，又把武侠小说写到了巅峰，空前绝后。王蒙在《哀悼金庸》一文中写道：“前一百年，后一百年，写武侠小说的，大概不会有谁超过金庸”“他在武侠迷路之中，加入了更多的人情世态，善恶凄凉，文化历史，地域风情，社会论说，还有，性格命运”。毛尖称“金庸是中国最后一个百科全书式作家”，正因为是最后一个，所以盛极难继。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在终于出了一部《山河令》。《山河令》的成功，并非简单的“偷师学艺”，单纯模仿一鳞半爪，而是怀着对金庸先生的高度敬意，沿着金庸小说的正大路子，结合“国风美学”，尝试创新，与时俱进，奏响一首金庸式武侠剧的当代变奏曲。而事实也证明，武侠情结早已深入中国人骨髓，只要有好的作品问世，中国人那一腔热血，瞬间就能燃起来。



《山河令》海报

## 关于阅读的三个问题

——写在第26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

曲水

一年一度，世界读书日。每到这个日子，首先想起的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和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其次，会看到各种电商平台、出版社、书店的各种公众号，发布花样繁多的“4·23”购书广告。再次，我们还能读到许多诸如“读书日，你读书了吗？”“读书节，我们来说说读书的好处”等文章。反正4月23日前后，阅读仿佛瞬间成了人人关注的焦点。想来也正常，人们总喜欢说些应时应节的话，做些应时应节的事。我难以免俗，也想在第26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说点个人关于“读书”的陋见。

很多朋友知道我喜欢看书，于是常问我：“你看那么多书，记得住吗？”我老实回答：“记不住啊，我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怎么记得住？”然后他们会凝视我几秒钟，露出一副“既然记不住，那你还看”的疑惑神情。说实话，我也很想问问他们：“看书是单纯为了记忆吗？”阅读能够培养智识，它是了解别人依靠思维能力，分析、理解、思辨问题，进而得出结论的过程。我们读书，真正的收益便是在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日积月累中所形成的。不过，这些提问者倒也首先承认了一点，即：书籍是知识的载体，读书能够增长知识。可惜此种理解是陷入了对学龄儿童的要求之中——只有小孩子才通过反复阅读来背诵课文和记住公式呢，成人的阅读绝非如此。况且，我们这个年代，已有了各类电子存储设备和简易检索工具，人脑在这方面无法也无需与之抗衡。当然，人脑也具备很强的记忆能力，且这种能力有着突出的选择性。如果我们看了一本好书，看过之后没有记住什么内容，那

么第一，可能是没看懂，说明你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与此书尚不匹配；第二，可能是不够用心，心有旁骛，自然就记不住了；第三，也是最常见的情况，可能只记住了里面特别精彩、特别能和我们的个体经验、理念相契合的内容。上述种种，皆属正常。

也有人问我：“纸质书会不会被电子书彻底代替？”对此，我大概算得上是个乐观主义者。纸质书有它不可替代的诸多优点。回忆一下吧，我们从童年时代接触书籍开始，首先接受的其实都是纸面“图像”，这种“图像”是指经过了排版的文字与插图组合。当目光触及“图像”后，我们才会逐字逐句地去阅读具体内容。科技进步带来了能够容纳上百成百千本书籍的电子阅读器。看的时候，用手指在显示屏右下角一点，它就会自动“翻页”，有的阅读器还会模拟出翻页的动作与声音。可看完作品后，你想要从中寻找某段内容，便有点困难了。纸质书则不然，它提供给读者的是更为自然、亲切、实际的感受，你会记得要查找的内容是在

书页的左边还是右边，约莫第几行的位置，旁边是否有插图……一切都有形象感。况且，纸质书翻着多舒服！装帧精美，书香沁人。尤其当下，春日烂漫，一茶一书，负暄阅读，真乃人间快事！

我们还会相对比较尊重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里涉及一个“知识”和“文化”的区别问题。大多数人只知道此二者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却说不清楚其同差别。简而言之，知识是可以解释的，便于掌握的，在现实生活中能发挥实用性的。而文化是抽象的，即便你努力去解释，听者也不一定能够立即明白。它是一种需要理解者自己去内化的东西。读书可以增知，可读书多的人不见得就有“文化”。什么是文化？笔者比较认同作家梁晓声的解释：“那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生活当中，我见过不少朴素的劳动者，他们读书不多，但却符合上述四条标准。

在“世界读书日”里，我不想苦口婆心地劝大家都去阅读。读书这件事，从来就不在于一日一时，而在于细水长流。我也不想劝大家务必要坚持阅读，因为坚持，便说明并非出于自觉自愿，而是仗着意志力在持续下去。作为成年人，真不想读书，又何必勉为其难？不过，若是愿意阅读，只是不善阅读，那就不妨从感兴趣的书入手，悬疑小说、科幻故事、诗歌作品……皆可。再进一步讲，我无论如何也读不进书，该怎么办？不怎么办！认真努力地积极地生活，去读懂“生活”这本大书即可。总之一句话，阅读是美好的，也是自由的！



海客 摄